

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接班人。经过艰难的思索和反复的衡量,他终于选定了一个人:王洪文。

周恩来带头拥护王洪文接班

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

在1973年8月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时年38岁的王洪文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排名仅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王洪文的平步青云,向国内外的政治领袖们表明了毛泽东已选定他作为接替自己的中共首脑的主要候选人。

毛泽东选择王洪文作为接班人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征着“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

其实,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但他明白,张春桥和老干部特别是军队老人势同水火,不能选。历史学者朱永嘉曾这样分析: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

毛泽东荐周恩来读汲郑传

让王洪文接班,周恩来被认为最受委屈。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周恩来告诉陈毅毛泽东要让林彪接班,陈毅吃惊地说:“怎么是他呢?应

该是你嘛!”不管怎么说,林彪还是位开国元帅,如今周恩来要侍奉的则是一位“儿童团”。

饶有意味的是,1972年,姚文元传达毛泽东指示,让上海组织人标点一些古书,分送给有关的人看。其中有两篇是给周恩来看的,一篇是《史记·汲郑列传》,一篇是《晋书·桓伊传》。汲黯、郑庄系汉武帝一朝名臣。汲黯很早就位列九卿,是元老级人物。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眼看着市井小人甚至自己的府吏都一个个爬到自己头上,也忍不住对汉武帝当面抱怨:“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

周恩来带头表态拥护王洪文

周恩来不是汲黯。王洪文接班,他带头表态拥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政军内老同志的说服工作。

1973年8月21日,“十大”前夕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老干部们斗胆提出了反对任命王洪文的意见。许世友说:“我认为名单草案中提名王洪文当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不合适,他在党内有什么资历?他对党、对革命有什么业绩?……”许世友提出,有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就够了。受到压力后他又改口说,可以再加上康生和叶帅。周恩来、叶剑

英出来做工作,叶剑英还批评了许世友。

1973年8月28日,按照程序,大会将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为支持王洪文,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委托王洪文代表他投票选举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投给了王洪文有力的一票。

王洪文主持批判周恩来

中共“十大”确定王洪文接班,十大的之前和之后,政治局两次开会批判周恩来。1973年11月,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王洪文积极参加甚至主持过批判会。批判会上,平时对周恩来礼敬有加的人,此时迫于形势,相遇亦形同陌路。周恩来身心交瘁,甚至已做好下台的准备。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外宾之后对周恩来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不亦乐乎啊!”毛泽东也在当天找王洪文谈话,指出:“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一场暴风骤雨这才化解。

(据《历史学家茶座》、《世纪》)

彭德怀险中苏联顾问的“招”

1952年7月,彭德怀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从此,彭德怀肩负起新的军事使命。他上任伊始,就遇到如何正确对待苏联顾问的问题。

彭德怀到军委工作之时,正值全军学习苏军经验活动普遍展开之际。当时,由于许多干部认识比较模糊,对苏军的某些经验不愿学习。为了统一全军的认识,彭德怀两次在全军会议上进行专题阐述,动员大家认真学习苏军的经验。虽然如此,彭德怀心中有数,对“洋顾问”不是言听计从。这个时期,他经手处理的事务中,就有许多没有采纳苏联顾问的意见。遇到有些事情盲目听从顾问建议的,他更是予以严厉批评。

不过,对于苏联顾问的事事“顾问”,彭德怀也有“中招”的时候,比如军队是否学习苏军实行“一长制”的问题,就是其一。所谓“一长制”,就是“按苏军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员,实行单一首长制”。

1953年上半年,由于苏联顾问的反复提议,彭德怀曾“一度设想和准备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在一次军委例会上,他提出军队团以上的政治部(处)可以不设政治部(处)主任一职,其职务由该级政治委员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培养为军事指挥员。并且将这个建议作为军委决定通知全军实施。”

同年4月中旬,军委审查《内务条令》修改稿时,彭德怀把有关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去,也表现出他准备首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的想法。到5月间,彭德怀在同苏联总顾问的一次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准备十年之后实行‘一长制’。”这时,罗荣桓向彭德怀当面陈词,深深触动了他。罗荣桓说:“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治工作制度过时了,政治委员作用不大了,要学习苏联,搞一长制。如果那样做,从井冈山时期就搞起来的政治工作传统不就丢掉了吗?”(见《罗荣桓传》)

“彭德怀认真倾听了罗荣桓的肺腑之言。他感到罗荣桓讲得很有道理,从而更增强了在实行‘三大制度’时,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党委制、坚持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决心。”(见《彭德怀传》)最后,彭德怀终于改变了原来准备实行“一长制”的主张。以后的几年中,他对“一长制”的思想,甚至还作过不止一次的批判。但因为曾在“一长制”问题上“中招”,使彭德怀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屡屡挨批。

(据中国论文网)

“文革”初期,北京市公安局被一锅端

“文革”中公安部门是“重灾区”,其中又以北京市公安局为最,这与曾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刘传新死心塌地为“四人帮”效力分不开。

诬称北京市公安局“敌特机关”

1966年5月,随着对北京市委的公开批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派出由44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夺权。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由军队接管。

军代表进驻公安局刚满一个月,军管会的二号人物刘传新就对北京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几个月以后,在刘传新主持下,军管会先后炮制了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

紧接着,刘传新组织起已达2000多人的班子清查全局各类材料,捏造了大量北京市公安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称历任公安局局长罗瑞卿、冯基平、

邢相生以及其他主要领导成员都是“里通外国、罪大恶极的坏人”!康生在刘传新的汇报材料上批示:“这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刘仁、冯基平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是有力的证据。”刘传新后来官至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等。

1968年8月,刘传新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24名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将814名干警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关押审查;还将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等人的子女70人关进少管所,强令他们揭发其父母的“罪行”。

对毛泽东的告诫置若罔闻

对于北京的腥风血雨,毛泽东有所察觉。早在1967年12月,毛主席对刘传新上报的诬陷材料就提出过质疑:“10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1000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然而,刘传新自恃有后台撑腰,对毛主席的告诫置若罔闻。

1976年清明前后,因悼念周恩来引发的“四五”群众运动中,刘传新特地布置“把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4月5日凌晨200辆卡车开进广场抓人,2000多个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被洗劫一空。

刘传新不仅组织全部警力卖力镇压广场民众,而且动用技侦手段,追后台、追线索。全市在“双追”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副部长和军级以上的干部被触及的近30名,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廖承志、秦秋里等人身上。

“四人帮”倒台后自杀身亡

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部署,刘传新也及时地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应急方案》。毛泽东逝世后,刘传新立即按《应急方案》部署,在公安局组织了3300多人的机动力量,准备枪支2400多支,棍棒1050根,机动车270辆,还有大批电台、报话机等通讯器材,并绘制了作战用的城区坐标图,可谓磨刀霍霍。

“四人帮”倒台后,1977年初,北京市公安局有人贴出大字报,强烈要求清算刘传新充当“四人帮”刽子手的罪行。1977年1月27日,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刘传新在接受审查期间,神经十分脆弱。他5月18日接到北京市公安局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5月19日上午自杀。1977年11月,军管会时期留下的793名军队干部也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

(据《湖南文史》)